

古代东亚历史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陈 拯 王 川

【内容提要】 古代东亚历史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日渐受到重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既有评估聚焦于发掘传统思想资源的理论成果,对以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检讨不足。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大致呈现为“理论应用型”“理论验证与修正型”“理论构建—普遍型”“理论构建—特殊型”等形式,在理论应用、修正与生成等维度都有所尝试。它们回应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展现出集中且明确的自主问题意识。与构建“中国学派”的辩论相呼应,不同研究对东亚历史经验的普遍性意义与知识增量效应的判断不同,呈现出追求独特性贡献与更大普遍性意义的张力。后续研究应尝试从历史经验中挖掘更具原创性的概念及命题,恰当表述并充分验证它们的有效性边界,拓宽研究的理论及历史时空视野,强化比较意识,在参与国际前沿对话中更好地定位自身理论与东亚历史经验,扩大中国知识贡献。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 东亚国际关系史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 陈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chenzheng@fudan.edu.cn

王川,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23110170019@m.fudan.edu.cn

新世纪以来,在推动学科发展、探索自主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实践成为学者探索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① 其路径大致有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号:2025JZDZ021)的阶段性成果。笔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及编辑部的修改意见。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9—11页。

两种。第一种是整理发掘传统理念与思想,从中获取理论创新灵感。以“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为代表,国内学界在此取得了突出进展,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受到国际学界关注。^①第二种是以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为实证基础的理论探索。相关研究逐渐摆脱了“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窠臼,或通过理论应用、验证及修正来发展既有(西方)理论,或基于东亚历史经验(进而结合东西方案例)构建解释范围不一的新理论。这同样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探索,但相比前一路径,受到的注意较少,对研究设计及其得失的检讨尤为缺乏。^②

以古代东亚历史为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探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应如何改进?本文梳理并检讨国内以刊发学理性文章为主的几本代表性国际关系期刊在新世纪以来所发表的相关成果,以期更好地把握相关研究的特征,总结经验教训,为规划未来研究议程提供参考。^③下文

①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0页; Peter J Katzenstein, “Is There a Chinese School of IR Theo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7, No. 3, 2024, pp. 222-241; Haoming Xiong, David A. Peterson, and Bear F. Braumoeller, “Reconceptualizing International Order: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8, No. 3, pp. 538-574.

②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东亚历史经验,也可能通过非实证路径进行理论探索。考虑到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基本属于空白,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实证主义路径的相关研究展开。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此的提醒。

③ 操作中,我们利用中国知网搜索整理了2000年至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这几本期刊所发表的相关文章(不涉及主要采取思想史路径或属于外交史性质的研究),并以相关作者为检索对象进行一定增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检讨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学界,不涉及港澳和台湾学界的讨论。类似地,本文对中国学者以外文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所发表成果也不作梳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显著增强,学界围绕是否以及如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开展辩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也不断涌现。上述几本期刊是发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果的主要阵地,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以此作为梳理和检讨的对象,能够较好地把握和归纳相关研究的特征。

首先勾勒相关研究的学术脉络及现实背景;进而梳理相关作品,辨别其利用历史发展理论的不同路径;随后,在有关“中国学派”争论的背景下,围绕理论及经验的“普遍性意义”与“知识增量效应”问题检讨相关研究的内生张力;最后就利用古代东亚经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提出几点浅见。

一、相关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

近年来,无论在中国、东亚各国还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以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为中心的东亚历史经验的兴趣都在增长。^① 以其作为实证基础的理论探索成为国内学界的新热点。这不仅是在回应有关中国崛起未来走向的战略辩论,还体现了日益增长的对于自主知识生产的追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陷入瓶颈,地方性知识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中的价值受到重视。^②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源自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传统。随着国际体系变局的推进,特别是非西方力量兴起,主要基于近现代西方历史经验形成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霸权遭遇挑战。国际学界正在兴起的“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倡议试图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知识纳入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和全球性的知识体系。这一潮流与中国学界

① 相关讨论参看陈拯:《无问西东:古代东亚秩序研究的自我束缚与解脱》,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第130—154页;David C. Ka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 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4, No. 1, 2020, pp. 1-29。有意思的是,与中国学者多倾向于通过挖掘和发挥传统思想来推动理论创新不同,国外学界多以古代东亚体系国家间互动的实证研究作为创新路径,相关讨论参看 Zheng Chen, “The Use and Misuse of East Asian History in IR Theorizing,”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7, No. 3, 2024, pp. 306-322。本文的“古代东亚”指近代西方殖民势力进入前的亚洲东部区域(超越一般意义上中国史讨论的范围,包含朝鲜、日本和越南等),时间大体以鸦片战争为界。

② 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第23—42页;Alastair Iain Johnston, “What (If Anything) Does East Asia Tell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2012, pp. 53-78; Rosemary Foot and Evelyn Goh,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Asia: A New Research Prospect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1, No. 3, 2018, pp. 398-423.

构建“中国学派”等努力相呼应,推动学者们利用古代东亚历史探求自主理论创新。^①

中国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学习引进,到应用转化,再到批判创新的过程。新世纪以来,伴随学科专业化建设的展开,学者们开始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行研究,进而发掘自身历史资源开展理论建设。^②叶自成开风气之先,分类梳理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尝试将之纳入国际关系理论谱系加以研究。^③阎学通及其团队在分析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推动结合先秦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开展理论创新。^④二十余年间,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启发的理论思辨成果不断涌现。除了广受注意的“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及“共生理论”,还有尚会鹏提出的“伦人”、王逸舟提出的“仁”“智”外交,余潇枫等提出的

①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4, 2014, pp. 647-65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0—15页;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7-85.

②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系统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参看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袁南生:《中国古代外交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③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中国外交思想史〉(第一卷)序言》,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第48—56页;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29页;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④ 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7—108页。

“和合主义”等。^①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尝试依靠东亚历史经验,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理论研究。这既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整体潮流的顺应,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积极寻求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宏观理论发展的停滞不仅使地方知识,也使中层理论成为理论创新的主流。^② 另一方面,青年学者有着更为系统的专业训练,熟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遵循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流程。^③ 考虑到学界在区域国别研究、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积累不足,以及信息和资料获取的障碍,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成为学者们获得理论灵感和展开实证检验的独特材料。这是利用东亚历史开展理论研究的关键背景。

二、利用东亚历史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路径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历史经验既是理论验证的证据依靠,也是理论构建的灵感来源。利用历史经验发展理论,既表现为在应用、验证及修正过程中维护并拓展既有理论的解释力,也表现为借助历史经验提出并论证创新性与解释范围大小各异的新理论。梳理近年国内几本代表性国际关系期刊发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它们的理论目标设定不同,所讨论历史案例的时空范围也存在差异,呈现出利用东亚历史经验推动理论发展的不同路径。^④ 本

① 参看尚会鹏:《“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29—43页;王逸舟:《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余潇枫:《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49—76页。

② Janice Bially Mattern and Ays,e Zarakol, “Hierarchie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3, 2016, pp. 623-654.

③ 其突出代表是以“以倡导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为基本特征”,以关注东亚历史经验为重要特色之一的“清华路径”。参看张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4期,第125—156页。

④ 此处路径的区分更多是为了梳理检讨方便。即便是同一位作者的不同作品也可能在研究问题、理论目标及经验证据范围上存在差异。我们的区分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在标题、摘要、正文及结论等的表述,但有时也会根据我们对文章实际内容的把握提出与作者表述不同的看法。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对象是以东亚历史为经验支撑发展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都期待构建超越所覆盖的具体案例本身的解释,带有理论本性意义上的“一般性”。本文所说的“普遍性”指的是所构建的理论其解释力和适用范围是否超越东亚经验。

节粗略加以归纳。

(一) 理论应用型

理论应用型研究尝试利用既有西方理论解释古代东亚历史的具体经验现象。这组研究假定某些东亚历史体系近似于近现代国际体系,认为基于西方经验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迁移到对东亚历史事件或现象的解释。应用既有理论解释东亚历史,一方面可以更为系统、深刻地理解历史,另一方面也将理论适用范围拓展延伸到古代东亚历史,展示和确认了既有理论的广泛解释力。它们往往与国际学界的前沿与热点议程相对接,积极将东亚案例纳入其中。

冷战后的美国单极霸权使制衡缺位和制衡规避议题一度成为热点。^①介入这一议题的讨论,胡波和姜维清从预期收益与合作难题的角度讨论六国制衡失败的原因,认为六国对领土利益的追求加剧了集体行动困境、信任沟通问题以及相对收益问题这三大合作障碍,导致它们未能联合制衡秦的扩张。^②漆海霞则提出为何在战国时期各国有效制衡了魏国和齐国的崛起,却未能有效制衡秦国崛起的问题。以威胁制衡理论为基础,她提炼了实力差距、地理距离以及是否为激进的修正主义国家三个自变量,通过比较战国时期列国对魏、齐的制衡及对秦的合纵,论证秦国成功统一六国的关键原因是其通过兼并(而非灭国)、连横与远交近攻等策略尽力避免遭受致命的制衡。^③这些研究将战国经验纳入了讨论范围,但基本的解释逻辑和变量(如实力差距,集体行动困境等)都源自既有理论。^④同样,近年来,国际秩序演进及规范退化成为前沿问题,一些研究结合英国学派等理论,将春秋经验作

① 参看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胡波、姜维清:《预期收益类型的趋同与六国“合纵”的失败》,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53—62页。

③ 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4—48页。

④ 可参看刘丰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刘丰:《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3—8页。

为案例带入了讨论。^①一些研究基于霸权稳定论等探讨特定东亚历史秩序的稳定性,^②还有些研究利用国际战略和外交决策相关理论解释中国古代具体对外战略行为。^③这组研究提出并回答某些东亚历史问题,包括介入史学界的某些争论。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将相关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视野,在应用过程中拓展既有理论的解释力。

(二) 理论验证与修正型

理论验证与修正型研究侧重于借助东亚历史经验对既有理论进行检验和局部修正。这组研究或利用东亚历史数据和历史案例对既有理论命题进行检验,或借助东亚经验暴露既有理论的不足,并据此对之提出具体的、局部的修正。这些努力在既有理论框架下对特定命题进行评估和修补,使既有理论边界更为明晰,整体效力得到维护。

王日华和漆海霞建立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数据库,对权力格局、制度安排、身份关系等变量与战争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发现血缘关系在短期内有助于国家之间的和平,长期来看则相反;同文同种的关系或观念与国家间战争之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④蒙克等构建了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内部政治与对外战争情况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结合“选择人理论”,验证世

① 冷鸿基:《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115—133页;陈拯:《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64页。

② 逢锐之:《晋国霸权与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稳定》,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第119—156页;赵思洋:《周边需求的视角: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公共产品》,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第41—66页。

③ 孟维瞻:《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第50—77页;苗中泉:《战略决策中的影响因素——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略实践为例》,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89—121页;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27—49页;于海洋、张保杰:《决策框架如何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基于南宋对金政策的辩论》,载《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4期,第86—111页。

④ 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3—120页。

袭贵族带来的统治危机增加了统治者发动对外战争的可能性。^①

除了理论验证,一些研究试图对某些具体的既有理论进行局部修正,以解释东亚历史现象。王存刚和刘涵发现,古代东亚不存在成熟的国际体制,但是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利益诉求的某种兼容性使以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得以形成和维系,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英国学派对国际制度和共有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② 基于北宋联金伐辽及宣和北伐的决策,于海洋和沈朝永补正前景理论,强调隐性参考点对显性参考点具有牵制作用。^③ 这些研究认为解释东亚历史经验需要对既有理论进行一定修正,但调整依旧在既有理论框架下展开,是局部、小范围的,并未在解释命题中引入东亚地方性要素,也未考虑其他区域案例。实践中,上述理论应用与验证—修正型研究越来越有融合趋势,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延展及局部修正。

(三) 理论构建—普遍型

理论构建—普遍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出并回答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研究困惑。这组研究以既有(西方)理论为基础推演发展新命题,同时将东亚历史(有时也结合其他时空案例)作为检验自身命题的经验例证。研究强调不同体系间的相似性,认为所讨论的东亚历史具有普遍性意义,能够以之为基础构建解释范围超越东亚历史的理论。

① 蒙克、曾极麟:《中国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78—105页。蒙克还与董琦圆合作,结合春秋会盟配对数据集,论证国君与卿大夫国内政治斗争对春秋等级制下会盟兴衰的影响。参看蒙克、董琦圆:《“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春秋等级制下会盟的兴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8期,第2—28页。

② 王存刚、刘涵:《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145—155页。还有研究质疑均势逻辑的普遍性。参看刘俊智:《“反均势逻辑”与国际体系的嬗变——“竞相扩张”与战国体系的终结》,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5期,第104—132页。

③ 于海洋、沈朝永:《胜利的失败:多重参考依赖与宣和北伐的决策缺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54—77页。另参见于海洋:《注定的失败:沉没成本与南宋对金战和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第53—75页;于海洋、史聿韦:《对外政策中的风险决策失控——以壬辰战争第一阶段和议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4期,第75—96页。

其中一些研究单纯利用东亚历史经验来构建和验证自身的普遍性命题,其中,崛起战略是一个热点。例如,杨原提出崛起国能否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受阻挠慑止霸权国的有效性、对小国是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以及对小国自我克制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并利用辽国和北宋争夺高丽以及满清入关前与明朝争夺朝鲜等案例加以验证。^① 张一飞对比三国时期蜀汉与江东两大集团的崛起过程,论证大国身份重构过程中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影响。^② 万晓提出崛起国与霸权国间的实力对比是影响崛起国对小国政策的决定因素,而文化亲和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利用隋唐对吐谷浑和高句丽战略这一组最相似案例进行了验证。^③ 沈陈基于春秋经验,注意到边缘国家在构建体系霸权时面临的合法性困境问题,指出为缓解其负面影响,边缘国家不仅需要不断进行规范学习以达到较高道义水平,还需要根据内外形势动态调整规范学习和结盟选择的组合。^④ 徐进比较战国时期秦、魏和楚三国的崛起历程,验证战略节奏影响国家崛起效果,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则是影响战略节奏适当与否的重要因素。^⑤ 总之,这类研究试图利用东亚历史经验提出、展示或验证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但实证分析中未涉及其他区域经验。^⑥

① 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2页。

② 张一飞:《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30—66页。

③ 万晓:《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30—68页。

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以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而道义现实主义的自我设定也是“普遍性理论”,虽受荀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启发,总体仍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范畴。沈陈:《边缘困境与春秋霸政——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扩展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期,第51—72页。利用“道义现实主义”的其他研究,参看吕振纲:《道义、合法性与国家实力——1592至1662年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权力转移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3期,第33—62页。

⑤ 徐进:《战略节奏与崛起进程》,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第1—26页。

⑥ 即便其中使用量化方法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蒙克通过创建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规范争论和国际战争正义性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讨论国内规范争论如何影响国际规范演变的问题。蒙克:《国内规范争论与国际规范演变——对“春秋无义战”的跨层次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25—52页。

还有学者在构建和验证自身的普遍性理论命题时,在东亚历史经验之外纳入了其他区域案例。与前述研究类似,这些研究也以既有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自身的具体命题,同时试图通过增加其他时空的案例,进一步完善方法设计,验证命题的解释力。这些研究近年渐有成为主流之势。

大国间的竞争与制衡同样是这组研究的重点。^① 杨原的一系列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曹炜和杨原提出了“大国共治”概念,结合春秋晋楚弭兵、宋辽争夺高丽以及美苏冷战对峙等案例,论证“共治”出现的条件是大国无战争及大国功能分异。^② 以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同盟与春秋时期的晋楚同盟为案例,杨原验证当大国受小国牵连而陷入“消耗战”时,可能通过“结盟”释放无意继续对抗的信号。^③ 此外,针对崛起国在面对霸权国遏制打压时的选择,杨原还在鹰鸽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如果霸权国的遏制没有逆转崛起国对自身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政策,反之则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政策,进而以北宋、一战前德国和二战后初期苏联等案例作了检验。^④ 国际体系与秩序的演变是另一个热门议题。刘若楠以明清后的东亚体系和冷战期间苏联为中心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为例,论证等级制的衰亡存在实力优势衰落与合法性权威衰落两种路径。^⑤ 叶成城对

① 王震、高程:《崛起国对外策略中的大国与周边》,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90—129页。

② 杨原、曹炜:《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29—65页。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参看万晓:《大小国有战争、需求排序与大国共治再解释》,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3期,第1—35页。类似性质的研究,参看戴正、王帅:《“二元等级”制:竞争中国家的战略妥协》,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4期,第161—193页;候为刚:《威胁认知差异与制衡成败》,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第135—163页;王日华:《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2期,第37—73页。

③ 杨原:《大国政治的喜剧——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彼此结盟之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38—68页。他还比较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国际体系中大国的“主动利他行为”,指出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是这一行为出现的关键条件。参看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4—50页。

④ 杨原:《对抗还是让步?——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第4—34页。

⑤ 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118—136页。

比从汉末到三国的中国历史和从宗教改革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国际关系史,对体系中行为体变异、选择的趋同演化机制进行了检验。^①

前述三组研究或直接应用既有理论解释东亚历史困惑,或结合东亚历史经验对既有理论进行局部修正,或进一步发展出新的理论命题,其理论推演都在西方国际理论的既有框架内展开。同时,尽管利用东亚历史的方式存在差异,上述研究均以特定东亚国际体系近似于近现代国际体系为前提假定。

(四) 理论构建—特殊型

理论构建—特殊型研究与上述三组研究的出发点不同,认为古代东亚体系与近现代(西方)国际体系存在某些不同之处(对差别程度的判断有所差别),套用或修正西方理论不足以解释东亚历史现象,需要从东亚自身的历史、文化、思想中挖掘独特的解释要素。^② 这组研究致力于探究某些东亚历史现象或模式(较少将之同其他区域经验相联系),构建专门的命题或模型,解释范围通常限定于东亚内部,创新主要体现在挖掘地方性解释要素,识别和验证其影响,进而挑战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假设,为发展带有地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开辟道路。

古代东亚的“礼治”“朝贡”秩序是国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其基本假定是这一体系同近现代欧洲体系存在关键区别。^③ 不少研究致力于构建

① 叶成城:《汉末与后罗马体系中的趋同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4期,第142—179页。

② 相比国际学界康灿雄等以之挑战西方理论的呼吁,国内学者对这一点的主张不那么强烈。参看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特殊型理论的核心在于将解释限定于特定情境。理论构建—普遍型与理论构建—特殊型两类研究的差别可能源于研究者在认识论上存在的差异,但未必总是如此。如本文展示的,同一学者可能同时从事不同类型的研究。

③ 相关讨论也日渐细化。万晓以“等级”作为朝贡关系的核心,将“名”与“实”作为分类的维度,划分出“名副其实的朝贡”“有名无实的朝贡”“有实无名的朝贡”以及“其他关系”四种不同的关系形态。参看万晓:《朝贡的名实与朝贡之外的东亚——分类框架、案例举隅与研究建议》,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3期,第63—104页。

对其组织和运行的理论解释,突出强调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陈康令分析传统东亚礼治秩序下的理(天下礼的基本原则)、力(权力资源运用的礼仪逻辑)和利(礼仪化的国际制度),归纳了东亚礼治秩序礼、理、力、利的“4Li稳定模型”。^① 更多研究则探究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因素在东亚朝贡等级制演进中的影响。例如,周方银和李源晋分析中朝宗藩关系的稳定性,认为正统观的强弱及相互契合的程度不但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稳定性,甚至能一定程度消解实力对比等的影响。^② 孟维瞻通过对朝鲜与明朝关系的过程追踪,论证儒家礼制是东亚藩属等级制生成和维持的必要条件之一。^③

中国传统战略的特性及其影响也是学界持续讨论的问题。杜哲元以西汉、唐朝和清朝经略西域为例,归纳了中国古代的“二元性战略文化”。其中,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是主导和常态的。^④ 侯长坤将“天下主义”战略文化区分为“名天下”“强天下”“柔天下”和“弱天下”四种类型,并分别以古代中国秦、汉、唐、宋四个王朝具体案例对以上四种亚文化的表现和特征进行了说明。^⑤ 如前文所述,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制衡规避是一大热点,一些研究以春秋时期“尊王”策略的效用为中心展开了讨论。周方银认为在松散等级体系下,“尊王”策略可以安抚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有效孤立和威慑体系内的竞争对手,减轻崛起阻力。^⑥ 徐进发现“尊王”和“攘夷”的效用各有其边界,其效用大小与所针对对象的价值呈正相关关系。^⑦ 漆海霞和孙兆瑞则指出当

① 陈康令:《试论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一种分析框架》,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29—59页。

② 周方银、李源晋:《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为例》,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29—54页。

③ 孟维瞻:《古代东亚等级制的生成条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第91—124页。

④ 杜哲元:《扩张还是自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31—58页。

⑤ 侯长坤:《战略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天下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5期,第110—135页。

⑥ 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

⑦ 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38—61页。

霸权国采取尊周模式,周天子接受霸主国的地位会导致其合法性下降,规范遭到破坏,促使崛起国倾向于争强模式进而导致大国战争增多。^① 他们相信“对这个特殊体系下诸侯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避免只是从欧洲的经验来理解大国崛起和争霸行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不同国际体系下行为体行为的理解,丰富大国崛起和大国争霸的研究,还对理解未来东亚秩序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对这种可能性展开拓展论证和检验。^②

小结

以上梳理简要归纳了国内学者借助东亚历史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路径。此处的区分基于归纳而非演绎,是初步的,各路径的界线并不严格,具体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混合性。^③ 作出这样区分,意在捕捉具体作品在研究设计上的主要特征,检讨不同取径对理论创新目标的不同设定,以及背后对于东亚历史经验的不同理解。

简言之,前两组研究针对某一东亚历史现象提出研究困惑并加以解释,或在理论应用、或在验证及修正的意义上发展既有(西方)理论。其实质是将东亚历史作为例证,并不认为东亚国际体系同近现代国际体系有着本质区别,也无意从中发掘提炼解释因素,重在既有(西方)理论的解释进行应用、验证、拓展和修补。第三组研究试图基于东亚历史经验构建普遍性理论,回答超越东亚经验的普遍性问题,假定东亚历史现象与其他现象存在共性,强调各种历史经验间的共性与社会科学的普适性追求。虽然其中也有一些研究试图从东亚经验中提炼带有一定创新性的见解,但这一创新仍局限于既有理论框架之内,主要将东亚历史作为理论验证的工具。最后一组

① 漆海霞、孙兆瑞:《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4期,第99—133页。

② 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34页。

③ 在操作中,我们主要考虑了作者本人在文章标题等处行文中对自身研究目标的设定。

研究致力于发展新理论,关注东亚历史中的具体现象,认为东亚国际体系至少在某些方面同近现代西方体系存在差异,需要针对性地提出新解释。同时,这组研究的经验与理论解释范围一般都严格地限定于东亚历史,对于战略文化和朝贡秩序运作中文化要素影响的研究是其代表。以下是对利用东亚历史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不同路径研究特征的归纳和总结。

表 1 现有文献利用东亚历史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路径

理论发展 路径	问题和解释 对象	历史经验范围	创新思路理论发展效果
理论应用型	某个/类东亚 历史现象	局限于东亚历史	基于体系相似性,拓展既有理论解释范围 强化既有(西方)理论外部有效性
理论验证与 修正型	某个/类东亚 历史现象	局限于东亚历史	利用具体经验验证和修正既有理论 维护既有(西方)理论外部有效性
理论构建- 普遍型	普遍性问题	部分研究局限于东亚历史 部分研究超越东亚历史	基于体系相似性,在既有(西方)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利用东亚(和其他时空)历史经验加以验证
理论构建- 特殊型	某个/类东亚 历史现象	局限于东亚历史	基于体系特殊性,揭示既有理论的界限,挖掘独特性解释,削弱既有(西方)理论外部有效性,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来源:笔者自制。

三、利用东亚历史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学派”辩论

利用东亚历史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过程相伴随,学界围绕“是否(要)

有中国特色理论/学派”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理论/学派”等问题持续展开激烈争论。^① 一方面,学者们在理论的本质、方法及其他问题上仍有重大分歧,对中国思想和经验的共性与特性定位也有不同,或强调中国经验与思想的独特性,或强调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一般性,有学者将其核心分歧总结为特殊性与普适性间的矛盾。^② 另一方面,学界也日渐凝聚出一些共识,强调理论自觉和自主知识生产的必要性,也相信除了思想观念和当代实践,还能够基于自身历史经验构建和发展理论。本节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主创新,特别是“中国学派”争论的语境下,进一步评估利用东亚历史经验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努力。

在已有讨论中,“核心问题”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实现自主创新、形成中国理论自身特色或学派的关键抓手。^③ 一国对外战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往往成为该国学者的关注重点,对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前面所梳理的各种研究,虽然在具体理论目标、应用历史资源的范围及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在理论议题与现实关切方面却高度重合,集中在诸如权力转移与崛起战略、制衡与均势、等级秩序等经典及前沿理论问题。这些都与当今中国在国际体系和秩序演变中的位置息息相关,体现出鲜明的自主问题意识,一定程度上

① 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5—28页;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的前途》,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第19—38页;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9—16页;俞正樑:《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国学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5—8页;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第1—13页;赵赫:《中国有国际关系理论吗?——“中国学派”的理想与现实》,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第29—33页;阎学通:《再论为何没有“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第4—7页。

②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第7—9页;孟维瞻:《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③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卢凌宇将这一学派生成路径的原则细化概括为“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参看卢凌宇:《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27—149页。

也形成了创新合力。^①同时,虽然有着相同的理论认识及方法论立场,关注类似议题,同样采取实证路径,但上述研究的理论创新思路与具体操作设计却大相径庭,对东亚历史经验的定位有明显差异,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中国学派”争论中的不同意见,也重现了争论背后“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张力。^②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研究历史的目的并不局限于历史经验自身,而是要形成、验证和发展学理性结论,使其具有超越特定经验的一般性意义,并发展边际知识贡献。^③同时,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都是相对的。某些特殊个案的发现可能推翻旧有的普遍性宣称,同样具有普遍性意义。如林民旺所指出的,一方面,理论生成可以融入“特色”;另一方面,理论验证需要遵循普遍的逻辑和程序。^④理论提出的过程往往受到自身文化和实践经历启发,也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尽可能发掘不同于他者的独特知识主张。然而,检验和评价社会科学理论的标准是普遍的,除了概念是否准确、逻辑是否严密,还要在更大的经验和知识背景中接受检验,辨析其普遍性程度(解释力范围)与知识增量大小(创新性质及程度)。

普遍性程度涉及特定理论命题与实证发现在不同时空之间的可迁移性,在方法论意义上表现为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的外部有效性(在本文的语境中即基于特定区域历史经验的研究结果可推广到类似情景中的程度)。一是空间维度的外部有效性,指的是基于某一地域经验发展的理论命题是否可以适用于更大地域范围。二是时间维度的外部有效性,即基于特定时段经验所构建的理论能否适用于其他时段。综合这两个维度,特定理论的普遍性程度及特定历史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存在四种可能:一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外部有效性都很强,理论适用性和解释力能够超越其构建过程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65—176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选题倾向也可能限制了探究的范围,造成理论视野狭隘、成果重复。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此的提醒。

② 阎学通:《再论为何没有“中国学派”》,第4—7页;孟维瞻:《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③ 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06—113页。

④ 林民旺:《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5—137页。

所基于的特定时空,历史经验发现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有效迁移,这也是多数西方主流理论的自我设定;二是理论命题和历史经验发现在时间维度的外部有效性强,在空间维度的外部有效性弱,通常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地域文化解释;三是理论命题和历史经验发现在时间维度上的外部有效性弱,但在空间维度则较强,可以解释类似历史阶段超越具体区域的共性现象,更常见于比较历史研究中;四是有些研究设定自身理论命题和经验发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适用范围都有限,只解释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的某些现象。

同时,知识增量讨论的是特定研究相对既有研究所做出的创新性贡献大小,存在性质与程度的差别。解释具体困惑、拓展理论适用范围(强化其外部有效性)本身也是知识增量的一种形式,而在本文的操作语境中,知识增量更重要的是指一项研究能带来多少与既有成果不同的独特理论认识,主要考察的是理论性贡献的显著(大小与独特性)程度。

评估理论命题的普遍性(历史经验发现的外部有效性)及其在学术脉络中的知识增量大小,为反思既有研究、介入“中国学派”争论提供了切实的路径。我们认为,理论的普遍性程度与其地域来源无关。“中国学派”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源于不同地方性实践的理论知识的外部有效性及知识增量对比,而归结点则在于怎样更好地提升中国学者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国际学界的竞争力。本文讨论的研究所采取的具体路径不同,但都意在发展理论而非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共同的出发点是从更为熟悉的东亚历史经验中发挥比较优势,发掘创新空间,提升竞争力。同时,相关努力也需要在一定的学术脉络中,通过比较和竞争,展现自身的知识增量。^①在此意义上,各种路径分异的核心在于既有(西方)理论在东亚历史问题上是否具有外部有效性(或者说其普遍性宣称是否成立),基于东亚历史经验构建的理论能否推广到外部,以及能带来何种性质、多大程度的知识贡献。

对应前文所梳理的不同研究,对不同经验及理论知识有效性的认识导致了不同的研究设计。理论应用、理论验证及修正型研究暗示:主要基于近现代西方历史经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其基本概念和分

^① 参看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页。

析框架适用于对东亚历史问题的解释,无需另起炉灶,最多只需要在既有框架内进行调整。东亚历史还可被用作额外案例,实现对既有理论的经验扩展和修正,进一步验证和增强其外部有效性。以漆海霞、胡波和姜维清对“制衡缺失”的研究为例,他们虽讨论战国体系同近现代欧洲体系走向的差异,却并不认为二者存在本质区别,相反以其相似性为前提。同时,既有理论经过调整和修正可以用于战国经验,战国经验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材料。^①

理论构建—普遍型研究则在提出理论假设的过程中注重从区域经验以及思想中挖掘创新解释,假定其能补充既有理论的不足。然而,需要承认的是,这些解释和命题仍是以承认既有(西方)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为起点,从既有理论推导和发展得出的,创新性是相对有限的。同时,这些研究者认为借东亚历史经验提出并验证的理论命题能超越具体时空界限,带有某种普遍适用性。^②例如,徐进基于战国时期的秦、魏、楚经验讨论“战略节奏”这个超越时空的普遍性问题,^③曹炜和杨原结合春秋晋楚弭兵、宋辽争夺高丽以及美苏冷战对峙等案例,论证“大国共治”及其出现的条件,^④这些研究都隐含了作者对古代东亚历史经验外部有效性的高度自信。无论是否纳入其他案例,这些研究在研究问题、经验案例以及核心解释等方面都不考虑“特色”,而是将东亚经验置于更一般性的概念框架下考察,突出其与其他经验的共性,在既有理论脉络下进行局部修正和创新,期待所提出的命题不仅能解释古代东亚的历史,还要能对近现代国际关系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解释。^⑤例如,在刘若楠等对等级秩序衰落的分析中,东亚历史仅起到案例作用,带有区域特性的文化等要素并非其关注的重点。^⑥

理论构建—特殊型研究的核心在于指出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形成的既有理论存在外部有效性的局限,不能被推广到东亚历史,因而需要挖掘和结合

① 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第4—48页;胡波、姜维清:《预期收益类型的趋同与六国“合纵”的失败》,第53—62页。

②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第7—13页。

③ 徐进:《战略节奏与崛起进程》,第1—26页。

④ 杨原、曹炜:《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第29—65页。

⑤ 杨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2011)》,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90页。

⑥ 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第118—136页。

特色要素来加以完善。同时,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解释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限定于东亚,不追求转移适用于其他区域。如孟维瞻在探讨古代东亚等级制反复生成的原因时,虽表示中国与典型藩属国家间的关系可归入等级制范畴,但操作中经验数据和理论解释范围都局限于东亚历史,着重凸显的也是儒家礼制这一区域文化因素的影响。^①

将上述检讨与有关创建“中国学派”的辩论相呼应,可以发现“理论应用型”“理论验证与修正型”以及“理论构建—普遍型”三组研究,均是基于特定东亚国际体系与近现代国际体系的相似性展开的,理论命题基本上发展和推导自既有理论。本质上来说,这三组研究并未突破既有(西方)理论,相反,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既有(西方)理论的解释力,拓展了其“外部有效性”。其理论立场、旨趣同“中国特色/学派”辩论中的“科学—普适”派特别是“清华路径”较为接近。与之不同的是,“理论构建—特殊型”的相关研究,针对的是东亚历史中的特殊现象,致力于从东亚历史经验中挖掘独特要素,解释及验证过程仅涉及东亚历史经验,并不试图将其拓展至其他时空,突出的是特定东亚历史经验与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差异,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较为接近。同时,在我们看来,目前这些研究仅符合秦亚青等所定义的“中国学派”的一部分特征。^② 在秦亚青看来,“中国学派”除了试图提出起源于中国的地缘文化语境的理论命题,在发展过程中还试图获得普适意义。换言之,这类研究应当从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探讨入手,在提出理论假设的过程中注重从东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挖掘创新解释,相信其能补充既有理论的不足,同时期待相关命题能超越具体时空界限,带有某种普遍适用性。^③ 然而,在既有研究实践中,被应用、修正和发展的理论大多是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少数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研究,系统检验和发展“关系理论”“共生理论”等“中国理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④ 这在

① 孟维瞻:《古代东亚等级制的生成条件》,第91—124页。

②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第9页。

③ 同上,第7—13页。

④ 参看沈陈:《边缘困境与春秋霸政——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扩展讨论》,第51—72页;万晓:《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第30—68页;漆海霞:《崛起信号、战略信誉与遏制战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1—37页。

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理论”虽正被积极地创造,却鲜少被有意识地在超越东亚历史及现实经验的更大范围内检验进而修正,从而明确其解释边界,验证并拓展其解释范围。这恐怕是现有研究最令人失望之处。可以说,构建“中国学派”理论尚未出现系统的实证研究议程,基本仍停留在应然呼吁和哲理思辨层面。这也是“中国学派”很难摆脱地方主义知识体系窠臼的关键原因之一。^① 利用源自东亚历史的理论去解释这一时空之外经验事实的研究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参看下图 1)。^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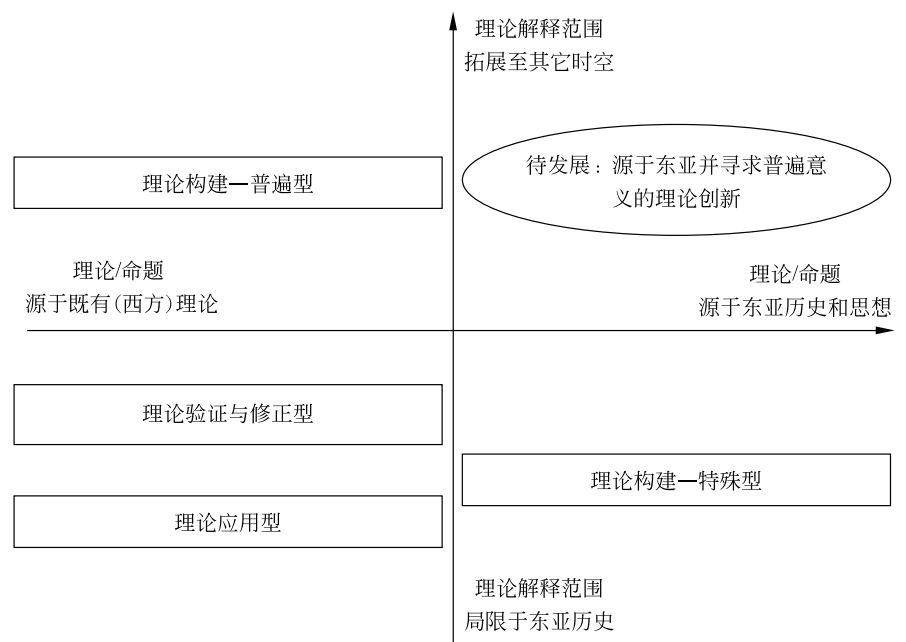


图 1 利用东亚历史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路径定位与发展方向

来源:作者自制。

① 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学派的兴起过程中“规范社会化”和“规范生命周期”研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佐证了开拓实证议程对理论发展破局的重要性。

② 邝云峰利用“朝贡”概念分析当代美国盟伴体系的研究可作为参照。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 年第 4 期,第 36—88 页。

四、更大普遍性意义与独特理论贡献间的张力

如何理解上述路径差异,包括对“中国学派”理论应用和检验的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表现为将自文化的知识要素挖掘出来并在与他文化知识的对话中推进知识再生产的过程。^①前面所梳理的研究都承认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的一般性意义,秉持实证路径,却又选择依靠(多少带有独特性的)东亚经验来支撑理论的创新性。^②真正的分歧不在于研究方法或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在于具体理论普适性与经验发现外部有效性间的比较。如前所述,利用区域历史经验的不同方式背后实际是在争辩理论普适性程度(及特定经验发现的“外部有效性”)与知识增量的性质及大小。不同的认识导致不同研究树立了不同的目标,采取了不同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就理论维度的知识增量而言,追求“独特性贡献”意味着要尽可能从地区实践中发掘不同于其他时空的独特主张,从而支撑和增强理论的创新性,而追求更强的“普遍性”或外部有效性则需要尽可能地拓展其相关理论命题的解释范围。在具体学术实践中,这两个追求之间往往存在着现实张力:一般而言,理论构建中越有“特色”,越讲求独特贡献,相关命题推广至其他时空的难度越大。同时,理论命题越有“一般性”,越强调经验的共通性,考虑到不同区域知识群体间的相互竞争,达成独特理论贡献的难度也更大。这一悖论给不同的研究带来了各自的问题和挑战。^③结果,无论是构建“中国学派”

① 秦亚青:《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9页。

② 不少人将“中国学派”局限于阐释型理论,恐怕也是种自我限制。Yiwei Wang and Xueqing Han, “Why There Is No Chinese IR Theory: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Yongjin Zhang and Teng-Chi Chang, eds.,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52-67.

③ 需要说明的是,如一位匿名审稿专家所指出的,“张力”并不等同于对立排斥、非此即彼,而是实践中的取舍困境。正如“中国学派”理论所追求的,一项源自东亚独特经验的深刻洞见(高知识增量)完全有可能具有高度的普遍性意义(高外部有效性),关键在于如何具体实现。我们强调,考虑到知识探索作为一项共同事业,不同群体间的创新竞争以及西方学者的先发优势使实现二者兼得要面对非常大的实践挑战。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

的努力及辩论,还是利用东亚经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在实际操作中都呈现出追求独特性贡献与更大普遍性意义的张力。

一方面,就那些致力于回答普遍性问题,发展普遍性理论的研究而言,如何准确把握东亚历史,特别是如何充分挖掘东亚经验在理论构思中的独特创新价值,确立并扩大在理论层面的知识增量贡献,是需要重视的问题。首先,无论是利用东亚经验生成问题和假设,还是仅仅以其作为案例,基本前提都是将其置于历史脉络中认真准确地加以把握和叙述。我们要小心检讨既有概念和理论的有效性,特别需要警惕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穿凿附会地用现代理论和概念裁剪事实经验的倾向,避免在阅读历史文献过程中出现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的错误。一个例子是,古汉语中的“盟”与现代专业文献所集中讨论的“同盟”未必是一回事。春秋会盟作为邦交行为,“会”多指特定集会活动;“盟”意指盟誓仪式,未必有军事同盟之义。如果严格按既有文献对同盟的主流理解来操作,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很少存在如近代西方国际关系中那种典型的、具有明确条约性质的军事同盟关系。^① 因此,相关研究的案例选取和数据库构建过程要更加谨慎和透明。

进而,在发展某种理论范式或命题时,如果单纯引入东亚历史经验作为案例和数据(无论是否包含其他案例),而不注意反思和检讨相关理论及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各种概念及知识,很可能只会强化西方理论,陷入其窠臼,错过或矮化自身经验的独特价值与创新空间,也难以引起国际学界的真正重视。一方面,相关案例本身就是以西方理论标准为参照选择的(也是通过其概念加以表达的),对东亚历史的研究也被限定在了诸如春秋战国或明清等特定时段,而忽略了其他时期或区域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另一方面,许多以“反常”为起点的“困惑解决(puzzle solving)”和理论修正研究(如“两面结盟”),所质疑与挑战的不过是某些对于既有理论的僵化理解,而其修正很大程度上只是强化了既有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某些结论。国际学界完全可能辩解那些“反常”案例仅仅是“琐屑例外(trivial outliers)”,因而

^① 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25—43页。这或许也意味着要推进同盟研究,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更可取的做法恐怕还是多考察近现代案例。

未必值得因此修正既有理论或构建替代理论。进而言之,如果东亚历史案例仅仅是中国学者开展理论验证的便利化选择(与其他时代及区域案例大同小异),对于国际学术界而言,既然不能提供更多的新见解,也就降低了其注意东亚历史的必要性。鉴于这些案例在不少研究中实际上并不那么特别,从便于控制时空变量以及创新成果接受(除非作为推广过程中的点缀)的角度,还不如选择更为切近的近现代案例来验证理论。

就此而言,要更充分地利用东亚历史资源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恐怕还不能仅停留在事实与实证层面,将其价值局限于观测值与验证机会的增加,还需要重视提炼更深层次的概念,推导更具替代性的理论和解释命题,从而更为充分地挖掘东亚历史经验的独特启发价值,并积极探索其外部有效性,拓展边际贡献。这也是秦亚青等“中国学派”倡导者的基本追求。在不同的时空文化情境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不同,思维方式和集体记忆等因素的差异会导致人的理解与实践产生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思维。^①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重从中华经典中挖掘概念工具,从而更好地将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背景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中,而如何将之与历史经验相结合,形成可实证检验的命题,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②“概念”是经验事实更为直接的反映,是思维方式的承载。核心概念是实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单纯地提出作为变量的标签还不够,需要思考发掘诸如“势”等背后所反映的中国人的思维认知与实践模式,并将之与既有学科概念进行系统对照,明确自身的贡献,加以体系化并应用于经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概念创新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要努力在同西方等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发现并克服彼此的思维定势与盲点,突破特定区域或特定历史时段经验的约束,探索实现不同区域概念与逻辑的对接、互补和融通。^③

① 庞中英、张胜军:《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问题与前途》,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第38—43页。

② 复旦大学潘忠岐教授及其团队所做的努力是突出代表。参看潘忠岐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国传统史学也有自己的概念、叙事模式和哲学,也有值得挖掘和现代转化的空间。

③ 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参看陈拯:《“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第156—174页。

另一方面,挖掘、汲取和利用东亚历史经验及思想的独特资源,进而将之理论化的挑战在于多大程度上能将它们真正转化为可迁移的、具有显著“普遍性”和创新性的解释,从而提升学术竞争力。一些研究寻找并突出各种“特色”经验现象,希望展示东亚经验的独到价值,以此暴露并突破西方理论的局限进而构建本土体系。然而,正如鲁鹏曾指出的,如果说西方理论的可靠性因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不完全吻合而被削弱,因而需要一种独特的中国理论来代替的话,那么在非中国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的视角下,中国理论也可能因为仅局限于自身经验,或与其他区域经验的不完全匹配,同样面临外部有效性不足的挑战。^① 过分强调特殊性,甚而偏执于其独特性,可能反而限制了东亚经验的普遍性价值和知识意义,影响其传播和接受度。近年来,对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在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强烈。争取自主知识生产,反对西方知识霸权无疑是重要的,但例外论和族群中心主义并非西方所独有。我们不应为了实现创新,或引起国际学界注意而刻意强调东亚独特性。原本作为防御性反应的自我叙述也有可能滑向学术民族主义和族群中心的自我例外论,重蹈“西方中心论”封闭自大的覆辙,引发外界的猜疑和排斥,甚至形成“东—西”二元对立框架,导致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进一步分裂和碎片化。因此,为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及国际影响,还有必要在学科整体脉络下更多讨论他人的问题和经验,进一步验证自身历史经验和理念的位置和意义。

更大普遍性意义与独特理论贡献间的张力在构建“中国学派”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此而来的操作难度恐怕是这类研究出现空白的关键原因。这类研究期待在东亚思想和经验中提炼出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意义的理论。对这类理论的应用和验证以不同区域经验的共性为前提。但是,就这些共性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早早占据了先发优势,积累了大量成果。结果,我们的不少研究在拓展命题的外部有效性的同时,往往也消解了引入东亚经验的必要性。例如,放在更大的概念范畴(如等级秩序)之下,包括朝贡在内,很难说哪个现象是古代中国所特有的,且没

^① 鲁鹏:《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共识及其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113—117页。

有被既有研究所触及。一些研究开始尝试在东亚经验中提炼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遍性理论。然而,既有理论在这些问题上的不足是什么,是否可以在修补后维持解释力,东亚经验和中国智慧能否以及如何能构成对既有理论的补充、修正乃至替代,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和论证。

总之,以东亚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研究介入并推动了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向的争论,使之有了具体实践,从而超越了抽象的应然思辨,也不再停留于口号。基于不同的历史认识和理论追求,具体研究路径出现了一系列分歧。既有理论思维的不足和盲点是什么,东亚历史经验与其他区域经验的共性和区别是什么,东亚经验和中国智慧如何构成对既有理论的补充和修正,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论证,进而寻求不同区域经验和理念间的融通。如何处置“独特理论贡献”与“更大普遍性意义”间的张力,需要学者们在研究实践中审慎处理一系列具体挑战,探求恰当平衡。

五、对推进后续研究的一孔之见

中国学者基于东亚历史经验的理论探索回应了学科发展的要求,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理论构建及历史视野方面还存在某些欠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亟待拓展(同时难度也较大)的结合(但不限于)东亚历史展开对“中国学派”理论的实证检验,在具体研究操作方面也有进一步检讨和努力的空间。以提升知识贡献与国际影响为中心,本文强调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离不开“开眼看世界”。后续要进一步跳出自我中心,超越中西二元对立,强化比较视野与竞争意识,以提升知识增量为中心,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理论视野下改进相关研究,基于古代东亚历史做出更有突破性、更具竞争力的理论创新成果。

(一) 准确定位自身理论与东亚经验在国际学术脉络中的位置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相关理论的有效性边界,更好定位自我理论与东亚经验同既有理论及他者经验的关系,更准确地表述自身研究在国际学术脉络中的位置,在比较、竞争中确立自身的贡献和价值。

理论创新不是割裂的,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通过与既有理论的有效对话建立起更为合理、有力的论断和主张,从而更好地解决各种问题和疑惑。

在验证某一理论和比较不同理论时,有必要首先检讨它们各自(或明示或预设)的解释范围,特别要考虑某现象是否在理论所预设的范围之内,以及是否存在既有理论也能解释这一现象。结合前文对既有成果的检讨,后续需要特别警惕两种倾向。

其一是误解甚至扭曲既有理论对自身解释范围的设定,忽视既有理论的多元性,特别是漠视既有学说可延展的空间与可修正的弹性,进而出现“为作新文强 puzzle”的情况。在研究实践中,当我们批评既有研究的局限性,包括质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效性时,恐怕要充分考虑相关文献,明确所质疑的对象。^① 对古代东亚历史的研究或许算一种比较优势,但并非中国学者的专利。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非铁板一块,内部始终不乏不同流派和观点之争。不同学派的假定、推演和主张各不相同,各种具体命题对自身适用范围的设定也不同。某一学派不能解决的,未必不能纳入其他学派框架下解决。前述多数研究都属于外交决策的范围,涉及的解释要素繁多,需要充分考虑竞争性假设。将诸如暂时的“两面结盟”“两极共治”等视作“反常”,除了历史视野的狭隘,恐怕也源于片面僵化的理论认识。我们不应低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性与可调整的空间,要真诚地与其展开竞争。在后续工作中,我们需要将基于东亚历史经验所提炼命题与既有理论的关系更细致地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哪些要素可以融入既有分析框架;对哪些因素的挖掘可能有助于补充和完善现有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又或者哪些特性需要超越传统研究范式,提出新的替代分析框架。

其二是未能准确陈述和细致检讨自身命题的解释范围。与辨析既有理论的有效性相对应的是,在构建自身理论的过程中同样有必要审慎界定自身命题的边界和限度。对于理论解释范围不加说明,没有进行有效检验就随意对之进行延伸,反而会损害其解释力,引发不必要的质疑,影响理论传播与接受。值得一提的是,既有研究大多忽略了审视相关命题在时间维度的外部有效性。声称国际政治的本质“千年不变”“四海皆同”固然值得怀

^① 类似的讨论,参看 Yu-Shan Wu, “The History-Informed IR Study on the Resurgence of China,” in Tse-Kang Leng and Rumi Aoyama, eds., *Decoding the Rise of China: Taiwa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49-50.

疑,相信某个区域的文化和政治逻辑将一以贯之、万变不离其宗,恐怕也成问题。即便某种理论对某些历史事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它也不一定能解释当代事件。诸如“朝贡—儒家文化圈和平论”等即便成立,考虑到近现代国际关系建立在全新的时空场景中,其也未必适用于对今日东亚秩序及其走向的认识和预测。^① 理论构建要避免“非历史的、也许是反历史的”错误。^② 除了空间维度的有效性范围,学者应注意明确表述并小心验证相关理论命题在时间维度的适用范围及条件,避免对国际关系进行非历史解读。

(二) 拓展相关研究的历史视野,注意东亚经验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除了将自我学说放在理论谱系与研究脉络中加以定位和发展,还要注意将相关东亚经验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视野中加以定位,注意东亚经验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首先要拓展比较的对象。在以古代东亚历史为案例进行理论验证和检验的过程中,除了注意案例选取是否恰当、是否具有代表性等问题,还可以探索与其他区域历史经验的对比,进一步辨析同与异。在利用自身历史经验的同时,我们还要强化对世界历史的学习,持续推进不同区域历史的比较研究,将自身经验置于人类历史交往演进的整体和互动视野中加以考察和定位,进一步明确东亚历史经验的理论价值。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基本局限于将古代东亚与近现代欧洲相并列和对照,却很少将之与同时代其他区域国际体系相联系(从而大体控制时代差异),恐怕是一大缺憾。以东亚的朝贡经验为例,除了检视它覆盖了东亚国际体系的多大时空范围,其在等级体系这一理论议程整体光谱中的位置如何等问题也值得结合其他区域经验继续探究。或许古代东亚历史经验确实存在与众不同的地方,亦或许它具有重要的普遍性意义,但这需要更系统的比较研究加以论证。当前国际学界重视各种区域历史经验的一大重要考虑是突破“威斯特伐里亚紧身衣”的束

① 国际学界对康灿雄研究的批评就集中于这一点,参看 Morris Rossabi,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by David C. Kang,”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6, No. 3, 2011, p. 511.

②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 148.

缚。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者的相关探索很大程度上依旧停留在旧有框架下,需要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如有学者所言,就挑战西欧中心主义而言,“欧亚相似性”或许是更有力的选择。^①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曼陀罗”秩序及“萨曼塔”体系等已有所探讨,不同非西方区域体系间的比较将是值得探索的方向,有待通过跨国、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加以推进。^②

其次,还要注意东亚历史经验本身的内在复杂性,包括东亚历史体系变迁的动态性。古代东亚历史实践和传统观念也是丰富多样的,不能对其作孤立和本质化的理解。可以说,既有研究的案例(或正或反)多是以特定西方理论标准为参照而被筛选出的,对古代东亚历史的探讨也就限定在了诸如春秋战国、宋代以及明清等特定时段,而忽略了其他时期或其他局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当前,有关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高度局限于某些时段和某类案例,这与学界在历史视野和知识储备上的不足有很大关系。要改变这一点,不仅有赖于客观环境的改善,更需要学者自身的努力。

实际上,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还有许多需要拓展的空间,也存在不少需要打破的“迷思”,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历史学界的合作和对话。^③我们既要突破“中国中心视角”主义,注意周边其他行为体的能动性,也有必要突破“中原王朝”视角局限,重视更加复杂、丰富的历史经验。^④我们可以

① Victoria Tin-bor Hui, “‘Getting Asia Right’: De-essentializing China’s Hegemony in Historical Asia,”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5, No. 13, 2023, p. 482.

② 吕振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曼陀罗:理论、历史与现实话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7期,第2—26页;张帆:《象征性权力与“浮岛体系”——中世纪南亚国际体系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6期,第40—68页。国际学界的一个可供借鉴的尝试,参看 Hendrik Spruyt, *The World Imagined: Collective Beliefs and Political Order in the Sinocentric, Islamic and Sou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③ 例如分裂曾占据了历史的颇多时段,而分与合的动态机理就值得探究。参看葛建雄:《统一与分裂》,商务图书馆2013年版。所谓的朝贡等级只能有效覆盖中原王朝与部分行为体在部分时期内的互动,即便在某些受到普遍关注的时段如唐朝,中原王朝也不过是亚洲多级体系中的一级。参看王贞平著、贾永会译:《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④ 一个例子是魏志江从东部欧亚区域史的视角,研究契丹族建立的以辽朝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基础、交邻体制并存的多元复合型东部欧亚世界秩序。参看魏志江、潘清:《论辽朝的世界秩序》,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12期,第160—172页。

从历史学界“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等经典命题中获得启发,进一步思考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多主体与层次的关联性。^①我们还可以将目光从陆上转向海域,在更广大的互动视野下考察丰富的东亚历史经验。^②

这又涉及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的挑战,特别是对不同历史记录的处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是复杂的,史学界对不少问题本身就争论颇多,很多时候既能找到支撑某种理论假说的历史记录,也容易找到反驳该种理论假说的历史记录。当学者们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素材可供选择时,往往更容易被那些符合他们预期的叙述所吸引。然而,这样做很容易导致“选择偏误”,固化对历史理解的片面以及对理论认识的狭隘。^③如何选择、诠释与调和关于同一主题的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历史记载是一项严峻挑战。^④承认我们对历史学研究成果的依赖,研究者应该在研究开始时明确考虑史学领域的争论,并积极地予以介入。^⑤最后,东亚历史还同现实政治有着复杂的纠葛。对东亚历史的全面考察要求跨国跨区域互动的多维视野,要求多国的而非单独一国的史料收集和利用。这除了要求更广泛的史料收集,更好的语言能力和史学素养,也需要学者们保持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克服狭隘民族

① 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1—355页。

② 颇具启发的一个例子,参看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4页。

③ Barbara Geddes,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 No. 1, 1990, pp. 131-150.

④ 例如,不少研究把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定格为“朝贡体系”,但许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学术神话,如何协调不同意见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参看 Saeyoung Park, “Long Live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Future of Studying East Asian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7, No. 1, 2017, p. 4。另一个可能的例子是,诸如战争的讨价还价等理论或许也能刷新我们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

⑤ Ian S. Lustick,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Multipl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Problem of Selection Bi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3, 1996, pp. 605-618.

主义情绪等的干扰,维护学术的真诚与自主。

结论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利用古代东亚历史经验开展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以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作为基本证据及思想启发,立足对中国外交的战略关怀,结合某些理论前沿议程,采纳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既有理论进行应用、检验、修正和替代,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尝试。过去二十年的研究实践展现了对古代东亚历史的不同利用方式。学者们基于对东亚经验属性及相关理论外部有效性的不同判断,设定了不同的理论目标,采取了不同的创新策略和研究设计,也遇到了各自的问题与挑战。这反映并推动了有关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创新的探索与争鸣,展示了其中的张力与复杂性。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各种努力有助于使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视角更全面多维。中国学者利用古代东亚历史的不同路径,在积极探索与相互争鸣中初步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贡献”,这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既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冲击,也有补充和完善的积极一面。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整体视野下,二者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

如时殷弘所言,“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都需要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理解”^①。区域历史是我们拓展理论和经验视野,进一步认识世界政治多样性与演化性的助力。东亚历史经验与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多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具体和相对的。如何处置相关命题在“独特学术贡献”与“更大普遍性意义”间的张力,需要学者们在研究中审慎处理一系列具体挑战。当前研究的一大缺陷是未能很好地定位自身相对于已有研究的创新及突破点,突出东亚历史经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独到价值。我们必须检讨各种操作背后的诸多假定,实现历史案例与当代理论探索更有效的融合。研究者需要更全

^①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3页。

面的理论视野,拓展历史时空视野,注重东亚历史进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进而努力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在融通的知识框架下开拓新的理论议程,提出更加准确、到位的创新性命题假设,并对其有效性范围和解释力边界进行系统检验,从而更加明确地表述和验证各种命题成立的时空条件性(conditionality),更加准确地定位自身研究在学科整体脉络中的位置,拓展中国贡献。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现有理论议程,还需要提升方法意识,开发更为精细的研究设计,在操作过程中注意克服选择偏误以及狭隘民族中心偏见,探索推进不同区域及不同时代经验间比较的可靠做法。

总之,以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为实证基础的理论探究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尝试,与发掘传统思想资源的理论创新一样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作为利用地方性知识开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代表,这两种路径的探索在操作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和挑战,而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则是有待开拓的“蓝海”。后续研究还要进一步拓展理论和历史视野,努力在时空两个维度开展更为系统的分析与比较,在整体知识体系中持续调校自身理论及东亚历史经验的位置。我们的目标不是单纯地把东亚历史经验和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纳入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知识体系内进行研究,而是在学术竞争中推进不同文化和知识之间平等对话,推动思维和视野的互补交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应孤芳自赏,故步自封,而要有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胸怀和抱负,既不妄自菲薄,也勿盲目夸大。在利用自身历史经验的同时,我们还要强化对世界历史的学习,既摆脱对他者的依附,又避免过度自我中心,在不同区域历史经验的系统对比与不同时段历史经验的脉络梳理中,更好地在整体学术体系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和贡献,以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对接和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